

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项目《陇山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研究》开会于6月7日在宁夏固原召开。该项目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强牵头，旨在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系统揭示陇山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陇山山脉作为泾渭水系的分水岭与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史前考古文化序列的完善对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陇山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成功入选 2024 年度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标志着该区域考古研究步入新阶段。

本次开会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编辑部，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多家文博机构、考古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与高校学生齐聚一堂。该会议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主持。

项目研究框架与核心目标

项目负责人马强系统阐述了课题设计。研究将聚焦史前地貌环境变迁、人群文化关系、生计经济模式、社会面貌演变等关键维度，整合碳十四测年、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手段，核心目标在于构建完善的陇山地区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厘清齐家文化、菜园文化及常山下层文化的关系。项目同时肩负人才培养重任，吸纳众多青年博士、硕士深度参与，旨在锻造研究能力、促进成果转化、构建人才梯队，并探索建立陇山地区多学科交叉研究模式。

基础研究与新近发现

项目第二负责人杨劼副研究员梳理了宁夏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历程与突破。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启的考古工作，以菜园遗址群、曹洼遗址、贡河子遗址的发掘为基石，初步构建了该区域仰韶晚期、马家窑文化、菜园文化至齐家文化的序列框架。然而，菜园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问题仍有待探索。

沙塘北塬遗址，距今 4100~3900 年，揭示了独特的文化面貌，以窑洞式与半地穴式房址为主，流行袋状“子母坑”灰坑。陶器群特征鲜明，以圆腹罐、单双耳罐为主，麻点纹盛行，花边罐丰富。多学科研究表明其生计以粟作农业为主导，家畜依赖粟黍，动物资源占比低。环境分析显示气候由暖变干，农耕活动增强。体质人类学与 DNA 分析指向该人群属古西北类型。综合其分布范围与文化特征，学界将其命名为“沙塘北塬类型”，填补了菜园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的关键缺环。

周家嘴头遗址经过连续五年的考古发掘，揭露出仰韶早、中、晚及龙山晚期四个时期的丰富遗存。仰韶晚期发现的 34 座陶窑群（多具环形火道的“胎窑”）规模宏大、形制统一，表明此处曾为重要制陶中心，附近伴存的房址与灰坑出土陶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龙山晚期遗存面貌与沙塘北塬一致。该遗址不仅首次在于宁夏发现仰韶早中期遗存，其陶窑群的发现更为研究史前制陶工艺与社会分工提供了珍贵实例。

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成果斐然。海原南山山区区，在 42 平方千米内发现 89 处遗址，其中 87 处属于菜园文化、2 处属于马家窑文化，聚落密集（面积多在 1 万~10 万平方米），年代距今 4400~4200 年。

葫芦河流域，发现 105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仰韶文化 10 处、菜园文化 65 处、沙塘北塬类型 30 处。并在一处约 80 万平方米的菜园文化遗址采集到玉琮，当为区域性中心聚落，年代距今 4450~4000 年。

清水河发源于六盘山东麓，由南向北注入黄河。目前正在原州区段进行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85 处，包括仰韶文化、菜园文化和沙塘北塬类型。

罗山地区调查发现 58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仰韶文化遗址 6 处、马家窑文化遗址 2 处、龙山晚期遗址 50 处，龙山晚期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文化面貌与宁南区略有区别。项目骨干成员高梦玲员以《彭阳红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收获》为题做汇报。红河是泾河的上游支流，发源于陇山高原，总长 137 千米，宁夏段长约 63 千米，流域面积约 400 平方千米。考古调查采用全覆盖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方法，面对旱地梯田地貌，一人一梯田观察地面遗物和地坎剖面上的遗迹，使用奥维互动地图打点采集陶片确定遗址分布范围。自 2017 年至今已开展 8 年的考古调查工作，目前还在持续调查中，累计发现各个时期的遗址 122 处，时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期。流域内仰韶文化遗址发现较少，总计 4 处，时代从仰韶中期到仰韶晚期，面积最大的有 15 万平方米，发现了窑洞式房址、陶窑、灰坑等遗迹，出土陶器、骨器、石器、玉器、动物骨骼等。齐家文化遗址累计发现 47 处，面积大小不等，最大的遗址面积 97 万平方米。发

现窑洞式房址、陶窑、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绿松石、骨器、动物骨骼等遗物。历史时期遗址有西周、东周北方系青铜文化墓地、宋代堡子和明代烽燧等遗迹，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玛瑙珠、费昂斯珠等。红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涵盖遗存类型多样，时代跨度大，对探索陇东地区聚落演变、生态环境变迁、生计方式、人文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工作，基本确立了宁夏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仰韶早、中、晚期→马家窑文化→菜园文化→沙塘北塬类型。菜园文化被确认为独立考古学文化，与常山下层文化关系密切；沙塘北塬类型作为新辨识的过渡类型意义重大。

多学科视角与技术支持

环境考古方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任小林回顾了陇山地区环境考古基础。宁夏地处三大自然地理板块交汇过渡带，环境多样性深刻影响文化面貌。他列举了葫芦河流域先驱性研究、古气候重建（磁化率、石笋记录）、孢粉分析等成果。项目将在红河流域、姚河塬等关键区域深化环境剖面研究，探索气候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内在关联。

制陶技术研究方面，西北大学副教授郭梦以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陶器为样本，运用扫描电镜、X 光、X 射线衍射及模拟实验等手段，系统解析了原料选择（泥质陶多用第三纪红粘土/黑土+高钙，夹砂陶用低钙粘土+河沙/岩屑）、成型工艺（泥条筑成法为主，或辅以模具）、修整技法（泥质陶刮削，夹砂陶拍打+刮削）、装饰技术（拍打纹、刻划、附加堆纹、彩绘）、施彩工艺（将干未干时绘彩后磨光，颜料为碳酸钙白彩、磁铁矿黑/褐彩、赤铁矿红彩）及烧制技术（窑内氧化烧成与堆烧并存）。未来研究将聚焦原料溯源、生产组织及区域技术交流。

年代学研究方面，兰州大学工程师曹辉辉强调了精确年代框架的基础性作用，阐述了碳十四测年原理、适用范围（近 5 万年）及样品选择标准（短生长周期、原生性、已知起始碳浓度），为项目建立可靠年代标尺提供技术保障。

专家把脉与方向指引

此次开题会议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项目设计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定位与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肯定项目“以课题带人才”、跨区域跨学科联合的模式。他特别指出宁夏南部齐家时代后至西周间的文化“间歇期”之谜亟待破解。南京大学教授水涛强调需明确陇山地区研究的时空范围与文化互动圈，关注其北段与甘肃中段、陕西南段的关联，建议拓展至夏商时段研究，深挖齐家文化起源。

二是方法论整合，西北大学教授陈洪海强调需整合区域资源，突破行政区划，深入探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关系。他提醒多学科研究须以核心问题（如生计模式）为引领，避免科技手段与传统考古脱节，加强团队沟通；并建议结合历史文献反推史前文明要素探索。西北大学教授罗丰赞赏项目多学科配置与年龄梯队符合国家文物局的培养要求，特别指出课题设计中有关专门玉器研究的内容，齐家文化玉器发达，可借此项目在玉器研究上再做突破。

三是核心议题深化，北京大学副教授张海认为需整合文化谱系、环境、聚落、生计等多线索证据进行综合研究。他提出菜园文化新测年（距今 4400~4200 年）与中原庙底沟二期晚期并存，可能撼动现有年代框架，需重新审视齐家文化年代及沙塘北塬类型定位，并建议关注陶器的礼器功能及经济因素。西北大学教授翟霖林建议明确“文明化进程”在本区域的具体目标，如对国家起源的贡献；纵向聚焦聚落等级演变，如中心聚落转移；横向剖析区域内文化差异成因及与周邻文化，如常山下层、关中西部等文化之间的联系，处理好新材料与老材料的关系。

四是区域对比与路径探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利平认为，陇山作为关中盆地西界与泾渭分水岭，其东西两侧在仰韶中期已显现不同发展路径，值得深究。他建议利用现有材料加强陇山西至区域对比，并围绕关键遗址规划后续工作，打包推进以获取系统证据链。

五是成果传播与支持，《文物》编辑部编审周艳明提到需关注陇山作为文化交汇地带在人类互动、生计模式多样性及文明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副编申耿均表示《文物》杂志将全力支持项目《文物》编辑部成果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发表。

本次开题会系统梳理了项目背景、目标与坚实基础，明确了多学科融合、关键问题攻关的研究路径。项目团队表示，将充分吸纳建议，完善研究设计，强化团队协作，立足陇山、放眼全国，致力于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上取得突破性成果，为揭示陇山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丰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认知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分析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与其学术遗产

宋殷

不太熟悉西方考古学史的朋友们可能会对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有一批从剑桥大学走出来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都是他的追随者，如因《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和《全球史前史》等著作而享誉全球并提出“社会考古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伊恩·霍德（Ian Hodder）、提出次级产品革命的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以及最早出版定量考古学教材《量化考古学》的斯蒂芬·申南（Stephen Shennan）。

1957 年 10 月，19 岁的戴维·克拉克进入剑桥大学的彼德堂（Peterhouse）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并接受了史前考古和古典考古方面的训练。在 1960 年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克拉克师从英国著名考古学家，迪斯尼考古学讲席教授格拉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攻读博士学位。格拉厄姆·克拉克以发掘 Star Carr 遗址并引入了孢粉分析等植物考古学方法，进而将生态学视角引入考古学而闻名于世，其著作《世界史前史》（World Prehistory）被再版三次并成为研究史前考古的必读书目之一。戴维·克拉克以英国史前大口杯陶器（British beaker pottery）的起源与发展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并引入了矩阵分析法来分析大口杯的不同属性特征。

在 1962 年，戴维·克拉克于《史前史学会会报》（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上发表自己的题为《矩阵分析与考古学：以英国大口杯陶器为例》的第一篇论文的同年，大西洋彼岸的路易·宾福德（Lewis R. Binford）在《美国古物》（American Antiquity）上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正式标志着新考古学时代的到来。这一年克拉克 24 岁，宾福德 32 岁。

20 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经济高速发展，核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技术变

■ 交流平台

革，使人们再次憧憬美好未来的年景。对于考古学界来说，碳十四测年带来的技术性变革让考古学家从通过类型学建立的年代框架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开始思索社会系统演进更为宏大的主题。1951 年的煤钢联营标志着德法两个世仇国家正式和解，欧洲实现了和平，古斯塔夫·柯西纳（Gustaf Kossinna）那样的民族主义考古学家在学术思想界失去了市场。同时，英法等国家的殖民地体系开始土崩瓦解，以色列在中东的复国及其所引发的几次中东战争等事件，标志着殖民地考古走向终结，在海外进行考古发掘越来越艰难。跨越国境的研究需求，以碳十四测年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地位，这些都标志着考古学向着科学化和数据化转型。而这也是戴维·克拉克出版《分析考古学》（Analytical Archaeology）的背景。

戴维·克拉克于 1968 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分析考古学》，在此书中，克拉克积极引入生态学、统计学、系统论、计算机科学等的知识，将文化视为一系列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结构，并引入矩阵分析、建模等手段对从器物属性到文化系统的考古学所涉及的不同研究层面都给出了自己的分析路径。

初次阅读《分析考古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此书难读、对读者不够友好。《分析考古学》在首次出版之时就迎来了“新的前沿工作”“太过狭隘”“器物本位”“过于野心勃勃”等不同评价。克拉克在此书中强调考古材料数据化的必要性，强调数据分析方法科学性，这实际上是在为欧洲的后柴尔德时代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并在之后 50 多年的考古学实践中促成了一个全球视野的考古学时代的到来。

而戴维·克拉克的这一学术遗产，对于中国考古学界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自农业在中国出现以来，各地形成了稳定演

让沉睡的文物资源“苏醒”——河北考古资料整理新路径

王晓琨 张文瑞



年多的奋战，成效显著，成果丰硕。目前已经出版《朔黄铁路平山段古中山国墓葬发掘报告》《河北灵寿岗北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等 5 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考古报告，《河北灵寿青廉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河北武安固镇考古发掘报告》等 6 部考古发掘报告即将出版。在《文物》《北方文物》《文物春秋》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10 余篇相关考古简报和研究论文，有力推动了考古学术进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针对青廉墓葬出土贝壳画开展的联合研究 A miniature world: Revealing warring states period shell paintings from zhongshan state by multiple - methods（方寸世界：用多种方法揭示战国时期中山国的贝壳绘画），于 2024 年 5 月 4 日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期刊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文化遗产杂志》）在线发表。此次研究借助科技手段，成功复原并再现了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遗址的贝壳画图像，将这一独特艺术形式的历史追溯至战国时期。这一成果不仅是河北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更是在国际考古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力量。

公众展示，践行文物活化增自信

赓续历史文脉，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文物和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们就像一部部无言的史书，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而博物馆，则是连接文物与公众的重要桥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整理完成的文物移交至地方博物馆或文化机构，让这些珍贵的文物找到了新的归宿。目前移交给承德市、保定市、衡水市博物馆、怀来县、易县、蔚县、安国市、灵寿县、任丘市、正定县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的文物有 12000 余件。这些文物极大充实了地方博物馆的藏品，并在地方博物馆中得到了更为专业、系统地保存、研究与公众展示。例如，一批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移交后，易县博物馆顺势推出“钤印两千年·燕下都陶文”临时特展，众多带有铭文的陶器精彩亮相。还有部分带陶文器物被充实到常规展线之中，这一举措为博物馆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赢得社会各界赞誉。

易县博物馆馆长张朋鸣表示，这些文物的回归意义非凡，它们是易县历史文化的瑰宝，让易水文化更加深厚，观众走进来，便能收获“一步千年”的游览体验。这次特展和展线更新，是深入挖掘、展示本土文化的重要实践，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为公众带来更多优质的文化内容。

文物展出后，观众反响热烈。在社交媒体上，好评如潮，网友们纷纷留言：“这些带陶文的陶器太震撼了，近距离观看，仿佛能触摸到那段历

进的社会组织，而陶器作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的重要遗物，以其类型学建立了新石器时代的年代框架，这一年代框架的可靠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代代生产陶器的先民之间稳定的代际传承作为基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器以藏礼”，饮食器具与祖先祭祀、礼制起源的紧密关联也意味着中国史前陶器与主要作为饮品和贸易陶器的西方史前陶器的功用和意义有所不同。而相比之下对于西方考古学而言，雕塑与绘画是与精神信仰层面更加密切相关的物质形式。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一些中国考古学家十分反感“碳十四革命”“新考古学”这样看似颠覆传统的说法。

但是不可回避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的推广，使中国也出现了戴维·克拉克在《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一文中所叙述的情景。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田野技术在科技的加持下不断更新，考古学发掘与研究也因技术、资金投入和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宏观时空尺度下的考古资料整合又要面临考古数据密度和数据质量不均的现实。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不知不觉中国，中国考古学也慢慢走上了考古学数据化的道路。

要想真正前进，就需要找到那个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把一个海市蜃楼的幻影当作目标。在今天这样的大数据时代，回望戴维·克拉克的学术遗产，有两个问题越来越突显。其一，新的技术如何与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共存？其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西方学术遗产的“继承者”的角色，真正产出原创性的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而不是仅仅贡献中国案例？或许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被某些人看作是伪问题，但是在深度全球化的当下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方向和道路，却是每一个学者都无法逃避的现实。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史。”不少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后，老师反馈：展览是一场生动的历史课，激发了学生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比书本知识更直观、更有感染力。

学生培养，传承文化育人人才

传承历史文化，助力高校学生全面培养，也是此次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鹿泉基地，学生们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他们从器物修复开始，亲手触摸那些古老的文物，感受历史的温度。绘图时，他们用细腻的笔触勾勒文物形态，将历史的精微之处永久定格；拍照时，他们以精准的镜头捕捉文物细节，为研究留下珍贵的资料。制作文物卡片、记录文物的信息、区分型式、分期排队、编写报告，每一个操作环节都为将来的实际工作积蓄着经验。

在鹿泉考古基地，整理工作的间隙从不是知识的留白。一场场学术讲座在此轮番上演，学术视野在思维的激烈碰撞中不断拓宽。与此同时，以中山国王厝墓、行唐故郡遗址、磁州窑遗址为课堂的游学之旅，更是让学生们触摸到河北千年文物的肌理。脚踏历史遗址的土地，眼观斑驳的文物遗迹，那些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在实地考察中具象化，完成了从文字到现实的奇妙转化，也让学习变得犹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

2018 年以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大同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等 10 余所国内外高校的 200 余名学子，一批又一批地自鹿泉走出，他们或继续读研、读博深造，或走向工作岗位，对鹿泉基地的难忘情感呈现在他们的留言中：

在鹿泉的时光，是一位快乐的老师，带着一群快乐的学生，在一个快乐的考古基地参加过的一场“快乐考古”。（宋阿云，中国人民大学 2016 级研究生，现供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落笔时我工作单位的新基地即将完工，无论南北东西，无论投入几何，我们都希望考古基地不仅仅是文物库房，而是更多地承担起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乃至与公众对话的责任。（陈宇涛，中国人民大学 2020 级研究生，现供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工作者以一颗赤子之心，凭借一腔孤勇，在烈日下、在严寒中拂去遮盖历史的尘土，找寻历史的痕迹，解读历史的真相，让历史永远鲜活。（王明艳，中国人民大学 2020 级研究生，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人事考试中心）

展望未来 再续辉煌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积极探索与创新，携手高校，整理积压考古资料，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石，更是连接历史与现代的桥梁。通过展览、出版物等多种形式，这些成果得以向社会公众开放，让更多人能够近距离感受河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展览中，精美的文物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出版物里，翔实的文字描绘着历史的脉络。考古成果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学术研究，而是大众共享的文化盛宴。

未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进一步探索考古工作的新模式，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专业的态度，让那些沉睡在地下的历史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